



《中国文化国情报告》丛书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情研究中心组织编写

总主编 胡惠林 黄永林 詹一虹

中国文化国情 报告

(2018)



主编 胡惠林

REPORT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ULTURE



长江学术出版 |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化国情报告》丛书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情研究中心组织编写

总主编 胡惠林 黄永林 詹一虹

中国文化国情 报告 ①

(2018)

主编 胡惠林

编委会

主任 黄永林 王永章 胡惠林

副主任 詹一虹 李炎 陈冬新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玉德 王亚南 王育济 车文明

叶林 刘玉堂 祁述裕 纪东东

李炎 李凤亮 何静 范建平

单世联 贾旭东 贾磊磊 廖 凡

黄昌勇 傅才武 谢梅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国情报告/胡惠林主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8.9

ISBN 978-7-5564-2081-0

I. 中…

II. 胡…

III. 文化事业—研究报告—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6646 号

中国文化国情报告 ZHONGGUO WENHUA GUOQING BAOGAO

出品人	方平	策划编辑	陈冬新
责任编辑	刘宁 邓珍珍	责任校对	李 镞
装帧设计	牛 红	责任督印	张遇春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教育出版社	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印 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货场路粮库院内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59.5		
字 数	1056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4-2081-0		
定 价	18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 027-83637493 进行调换)

目 录

CONTENTS

总论 文化国情：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逻辑前提与决策基点 /1

总报告 中国文化国情指数报告 /35

分报告 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十二五”文化国情报告 /109

第一章 北京市“十二五”文化市情报告 /111

第二章 黑龙江省“十二五”文化省情报告 /154

第三章 吉林省“十二五”文化省情报告 /177

第四章 辽宁省“十二五”文化省情报告 /197

第五章 天津市“十二五”文化市情报告 /217

第六章 河北省“十二五”文化省情报告 /232

第七章 山西省“十二五”文化省情报告 /258

第八章 内蒙古自治区“十二五”文化区情报告 /280

第九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五”文化区情报告 /305

第十章 青海省“十二五”文化省情报告 /328

第十一章 陕西省“十二五”文化省情报告 /349

第十二章 甘肃省“十二五”文化省情报告 /366

第十三章 宁夏回族自治区“十二五”文化区情报告 /389

第十四章 重庆市“十二五”文化市情报告 /415

第十五章 云南省“十二五”文化省情报告 /465

第十六章 贵州省“十二五”文化省情报告 /514

- 第十七章 四川省“十二五”文化省情报告 /554
- 第十八章 西藏自治区“十二五”文化区情报告 /581
- 第十九章 上海市“十二五”文化市情报告 /596
- 第二十章 安徽省“十二五”文化省情报告 /622
- 第二十一章 江苏省“十二五”文化省情报告 /648
- 第二十二章 浙江省“十二五”文化省情报告 /680
- 第二十三章 山东省“十二五”文化省情报告 /711
- 第二十四章 福建省“十二五”文化省情报告 /738
- 第二十五章 河南省“十二五”文化省情报告 /769
- 第二十六章 江西省“十二五”文化省情报告 /793
- 第二十七章 湖南省“十二五”文化省情报告 /811
- 第二十八章 湖北省“十二五”文化省情报告 /834
- 第二十九章 广东省“十二五”文化省情报告 /858
- 第三十章 广西壮族自治区“十二五”文化区情报告 /898
- 第三十一章 海南省“十二五”文化省情报告 /917

后记 /942

总论

文化国情：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
逻辑前提与决策基点

文化国情：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逻辑 前提与决策基点

胡惠林

一、问题的提出

什么是文化国情？我们时代的文化国情是个什么状况的？为什么要了解和掌握文化国情？文化国情对于今天中国的文化发展价值何在？在中国的文化国情下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怎样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才是和这个国情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需求相一致的？

文化国情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综合能力的文化反映和文化表现形态。它既同这个国家过去的综合能力相联系，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现在综合能力的直接反映。有什么？能做什么？能做成什么？这些是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有什么？是指它的客观条件，即客观存在的资源禀赋。能做什么？是指它的主观能力，即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能做成什么？是指它与外部的关系，即主客观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文化国情应该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呈现。

一个国家的文化国情是这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综合能力历史发展的一个现实结果。政治体制决定了它的文化体制及其文化资源配置的方式，经济基础决定了它的文化生产力形态和文化资源配置的能力，社会形态决定了它的文化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和文化资源配置的现代性。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文化发展的差异性，都是由这三个方面决定的。

文化国情的构成要素，有多种划分尺度。这在联合国、欧盟和中国有关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其实，指数研究中不同指标体系的设定，恰恰是对不同文化国情的一种选择性反映。在中国，所谓文化国情至少包含了以下基本要素：国土面积、人口规模、经济体量、人均 GDP、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的

存量、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投入与产出、人均拥有公共文化服务总量，等等。这些基本要素和国家文化存在的常量值，构成了中国文化国情。这样的文化国情定义是通过和借助于这个国家的整体性来表现出来的。但是，由于上述指标的客观差异，不同地区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国情”是不一样的。本报告所反映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国情差异，现实地展示了现阶段中国文化国情的基本面。这反映出中国文化国情存在着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内部与外部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是文化国情构成最重要的动力结构。如何处理这样的矛盾与冲突，构成了这个国家文化治理的重要主题。我们关于文化国情的认知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出发的。

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是文化国情构成的最重要的核心部件。文化产业在中国的迅速发展，构成了近20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在改变了中国文化发展形态和增长方式的同时，带动了中国文化国情的深刻变化，也提出了中国需要怎样的文化产业的问题。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发展不平衡，提高与实现了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同时，也提出了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效率，如何提升中国文化国情构成的内在文明质量等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

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因为矛盾是构成事物发展的基本要素，决定了事物发展的属性与特质。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什么？文化的矛盾运动在当前中国发展中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种作用与文化建设、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力量的培育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城市与乡村、东中西部、沿海与内陆、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在文化发展上会出现如此巨大的不平衡？什么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本位？怎样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否得到提升的标准是什么？如何正确处理这种提升的需求规律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怎样制定风险评估的尺度和标准？文化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是由文化运动的矛盾造成的，并不断引起人们的关切和忧虑，成为困扰当前中国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所有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我们对中国文化国情整体性认知的不足。它不仅一般的涉及关于文化的定义，关于文化的认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因而，同时又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建设的实践问题。尤其是在中国文化正在逐步展开它的无限的丰富性的时候，它的丰富的矛盾性也进一步展现出来，并由此而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从而

使中国文化的发展遭遇到新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我们的文化国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和怎样认识中国的文化国情的问题日益凸显。我们已经有了许多关于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对中国的基本文化国情状况依然缺乏全面的了解，从而使得我们的文化发展规划、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常常严重地脱离中国文化国情实际。

“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是两个分别来自不同领域的议题。在给中国发展带来新的挑战难题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走向，从而使得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作用，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再定位阶段。在中国文化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之后，对中国文化国情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意义。这就使得关于文化国情演化规律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原理性基础建设意义：中国文化发展是否也同样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在迄今为止关于文化发展理论、文化产业理论、文化政策与战略的研究中，似乎都未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在中国的学术界和业界，甚至于文化政策界，关于中国文化国情的全面而系统地了解与掌握还是一个盲区。至今都缺乏一个如全国人口普查那样的“全国文化国情普查”。虽然有关方面也做了一些这样的工作，如中国的学术界近几年来在关于各种类型和领域里的“蓝皮书”和“指数研究”中也都有意无意、或浅或深的涉及了这个问题，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上中国国土面积大、民族多、文化发展多样、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社会形态复杂，使得“全国文化国情普查”异常艰难，难已实施。

另外，在文化发展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地丰富过程中，尤其是在文化产业科技化、资本化、文化产业旅游化以及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进程中，文化前所未有地深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的时候，文化本身的发展构成、价值构成和生产力构成似乎被人们遗忘了。又使得文化发展的本质与中国文化国情发展的本质路径不断地被消融于科学技术和经济指标的形式之中。比如为了GDP而忘记了价值，为了科学而遮蔽了文化；一方面投入巨资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方面又造成了大量新建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闲置。

中国正进入到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阶段，亟待对这新阶段的文化国情了解把握、认识与研究，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出新理

论、新理念、新战略，为重建文化自信奠定历史逻辑与现实基础。

二、充分认识和把握文化国情是制订一切文化政策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切政策与决策，都应该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这是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逻辑前提和决策基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指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特性那些最本质的、最深层的，包括文化生产力在内的社会生产力构成。它是一种平均数。新的发展阶段是指这个初级阶段在发展的不同时间节点上所呈现出来的新的发展态势、发展面貌和发展格局，显示了社会生产力在总体初级阶段上所处的一种成长性水平。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其表面形态上正在发生极度快速的变化，恰如波涛汹涌、白浪滔天的大海，然而，在大洋深处，这种变化依然是极其缓慢的。这就是初级阶段和新的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这也是今天中国文化国情构成的基本状况。一个国家的文化国情是由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共同构成的。当历史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方式成为现实的文化存在构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时候，当历史不仅积淀为所有的文化资源形态，而且还表现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构成形态与发展形态的时候，历史就是现实。今天中国的文化国情既是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表现，也是历史运动的一个结果。二者的共同作用构成了中国文化国情的存在方式、存在形态与运动结构。中国文化国情的一切表现都是历史和现实、一切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产物。这是我们认识、了解和判断中国文化国情的基本出发点。

1. 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同时并存，构成了当下中国文化国情最基本的“三叠加”特征，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国情构成形态

农业、工业不同生产力文化形态的构成成分，决定了今天中国文化国情的基本构成。今天的中国依然受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思想及其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既是中国社会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现代化发展的阻力，具有很强的历史惰性。这种惰性是文明型惰性，非经过一个长时段的现代

文明的演化与改造而不会消失。这是今天中国社会发展中生产力文明与精神价值观文明的重叠与冲突，文化产业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这种重叠与冲突的集中表现。一方面我们要发展文化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又是用一种“跑马圈地”的落后方式来发展文化生产力。这就构成了发展文化生产力与发展这个文化生产力的方式不相适应的矛盾。这种矛盾与冲突构成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张力，同时不可避免地构成了对文化生产力发展内生需求的破坏。文化与科技相结合的重要战略价值就是要从根本上重塑和重建中国的文化生产力形态，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这种“三叠加”的社会构成形态反映在文化产业上就是传统文化产业形态、现代文化产业形态和后现代文化产业形态的同时并存与互相叠加。正是这种互相叠加，构成了中国文化产业结构形态所表现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地理环境、日常生活、文化传统等“长时段”的结构，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构成了长期性影响。文化产业成为所有这一切的表现载体和表现形态，并且对历史发展“长时段”以“反影响”：重构人与社会的地理环境与空间关系、日常生活与价值态度、文化传统与历史关系。

2. 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形成了东部集聚、西部分散的中国基本文化国情中社会文化生产力构成的基本特征

中国文化经济国土空间分布结构实际上也就反映了人与自然和社会文化生产力之间的空间构成性关系，人口空间分布及其数量和质量构成的“胡焕庸线”，是文化生产力国情在空间分布数量和质量构成状况的分界线。

“胡焕庸线”是一条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从云南腾冲直至黑龙江黑河，将中国划分为东西两个人口分布空间形态。该线以东 43% 的国土上生活着 94% 的人口，而以西 57% 的国土仅生活着约 6% 的人口。这一人口地理分布的“胡焕庸结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土空间依据，也是今天中国文化产业国土空间结构的主要存在形态，即中国 94% 以上的文化产业分布、集中在中国东部 43% 的土地上，而只有不到 6%（甚至更少）的文化产业分布、集中在 57% 的国土上，其文化产业空间布局悬殊之大，世所罕见。而恰恰是这样一种国土空间的人口分布结构，决定和造就了中国文化产业存在与发展的文化生产力构成及其数量与质量关系。其原因极为简单：没有人口的地方是没有文化产品和文化的精神生产的；人口总量的多寡影响和决定了文化产品的社会生产能力和社会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能力。作为文化生产力空间关系的文化市场是由人以及人的数量建构起来的。

人口的基数越大,文化市场的规模越大;人口的基数越小,文化市场的规模越小。因此,对一个文化生产力空间资源相对狭小和有限的国家与地区来说,拓展空间就往往成为其对外文化扩张的重要动力。

生产力的构成包括自然条件所提供的物质能力,自然条件和环境的宜居性在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人口的集聚程度实际上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相宜性程度的表现。中国人口地理构成的“胡焕庸结构”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文化关系性结构的典型表现,并由此而锁定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生产力关系的空间构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经济国土空间分布结构实际上也就反映了人与自然和社会文化生产力之间的空间构成性关系。这就使得“胡焕庸线”不仅是一条中国人口地理的分布线,而且也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在国土空间关系上的文化生产力构成:东部集聚而西部分散。这是在文化空间发展关系处理上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任何对于这个原则发起挑战的文化经济和文化产业发展规划都是“反胡焕庸线”的,即反中国文化在国土空间形态上文化生产力布局规律的。一定要在那些生态环境极为脆弱、人口稀少、文化市场基本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的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甚至是地震频发地区建设“文化产业走廊”,势必会造成对人与自然社会文化生产力关系空间构成的破坏,进而造成人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破坏。这不应该是中国文化生产力发展空间布局的选择。

西藏处于“胡焕庸线”以西,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藏民族的游牧文化是藏民族为适应青藏高原特殊的海拔及水土光热条件而形成的以游牧为主要特征的草原文化。这种游牧的生计方式不仅是确保藏民族及其他游牧民族生计的适应性生产战略,同时也是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的生活方式。千百年来游牧文化促进了草场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使得青藏高原不仅维系着中国的生态安全,甚至维系着整个人类的生态安全。草原牧区是一个具有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四元一体”的耦合系统,而其生态系统绝非仅仅是自然形成的。一旦“四元一体”的耦合系统的稳态关系被打破,带来的将不仅仅是草原文化的衰落,更是草原生态的退化和社会组织结构与关系的全面失衡。目前全球荒漠化的趋势多与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有关。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不只是全球气候变暖,单纯地追求普遍的工业化带来的西方现代化文化取向,对文化多样性价值的蔑视,违背生态系统的演替规律,都是导致生态灾难的重要原因。^①

^① 胡敬萍:《生态恶化与本土文化丧失有关》,《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4月27日。

3. 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将长期制约我国文化国情运动的基本动力结构形态

区域发展不平衡本质上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区域间的反映。区域发展不平衡与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同时提出了文化再分工和文化关系再建构问题。区域发展显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建立新的与主体功能区战略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新战略，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生产和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把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同推进传统文化现代化结合起来，正在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性命题。

经济区、城市群、功能区、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等经济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与经济政策的不断更新，提出了文化发展如何与此相适应和能否与此相适应的问题。多少年来，城乡区别不只是居住地的区别，而是身份、地位和价值的区别。人们渴望身份的转变，是基于城乡间的不平等。倘若城乡在权力结构和价值上是平等的，那么，城乡差别还会如此大吗？城镇化的关键是去文化的不平等化。城乡文化发展平等了，在哪里都一样。在现阶段，科学理性背后依然是经济理性为动力，而非朝着实现人文理性回归的准备机制，城乡二元结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与社会的一切文化关系仍将是长远影响中国文化发展最基本的社会文化关系。这一关系的变革，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国情发展的空间关系与空间结构。“西部大开发”是中国的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基于西部落后于东部这一基本国情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战略实施所改变的不只是西部地区落后的经济发展，而且会重建整个西部地区的人与社会的一切构成关系，进而重构中国整体性人与社会的构成关系。西部地区曾经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起源地之一，是世界四大文明交汇地之一，拥有极为丰厚的文化资源储备。祁连山下、河西走廊、丝绸之路，曾经以独有的东方文明辉煌而耀眼世界。毫无疑问，中国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及其空间构成，只有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才可能获得它应有的、全新的和符合西部地区构成逻辑的文化发展。但是，西部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长时段演变恶化，在给我们留下交河故城、高昌古城之后，又留下了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玉门。文化与人口不断往东迁徙，使得生态环境的修复比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自然环境的休养生息是文化生态系统休养生息的基础和前提。只有自然环境生态系统与文化生态系统同时得到生态学意义上的生命恢复，西部文化发展战略实施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中国文化国土空间战略的重心在中部，而不是在西部和东部。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

徽、湖北、江西、湖南六个相邻省份，有着中国最大的人口规模（近4亿人口，占全国总量的30%）。新的中等收入人群的增长与扩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新的文化消费市场的生成，将以前所未有的能量激活中部地区无限丰厚的文化资源，这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无法比拟的。新的中等收入人群在中国的空间分布不均。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地方文化资源储备的不同质量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真正构成的当地需求及其带来的增长的机遇。经济增长和中等收入人群的形成与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密切相关。我国中部地区城市群的迅速崛起和以高铁、航空港为骨架的现代基础设施快速布局，“一带一路”的海陆空连接，使得整个中部地区成为中国整体发展的战略腹地和物流、人流、文化流的核心骨架。这种中部文化战略性发展的国土空间基础，构成了东西部地区所没有的战略优势。在这个基础上，中部地区文化产业的战略性崛起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结构，与此同时，对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提供的新能源系统，将从根本上助推中部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经略中部应该是中国整体性文化发展的战略重心，实现这个重心的战略转移应该是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

中小城市是中国文化生产与文化发展最大的蓄水池，是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战略性构成空间，同时也是制约中国文化发展的硬瓶颈。如何打破公共文化空间束缚格局？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包括县级区划数2800余个、300余个地级行政单位（含地级市、州）、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除了几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与副省级城市之外，中小城市构成了现阶段中国城市的大多数。虽然，经过30多年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中小城市文化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文化生产力资源配置格局依然处在一个发展不平等之中。中小城市占据着中国城市总量的大多数。他们是城乡二元对立的缓冲区，同时又是城乡融合的桥梁与纽带。中国文化国情的整体性变化，将不仅仅取决于若干个特大型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全国的中小城市。他们既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市场，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生产力潜在空间。他们的公共文化空间的创造性拓展，将从根本上打破现阶段公共文化空间束缚格局，从而释放出巨大的文化生产力。中国文化国情的未来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一格局被打破的程度和文化生产力被释放的程度。

任何空间在时间上的缩短都必将带来和导致权力结构的调整、变动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资源的重新配置。高铁在为人们通行提供便利的同时，

也改变了人们之间的空间关系，导致人们空间关系的重组以及空间文化资源配置与文化生产关系、文化消费关系的重组。时空压缩将改变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和空间结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所谓“三跨战略”在这一状态下正在被赋予新的意义。需要有新的战略思维与理论对正在深刻变化中的文化空间转型做出新的研究与概括。“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以及中国城市发展规划和城乡一体化进程提出来的一系列中国战略地理的空间革命，在重塑中国各个领域里的社会地理空间关系的同时，也将重塑人们之间的空间文化关系，并且在文化空间关系的发展演化中深刻地表现出来。原有的以行政区划配置文化资源的文化行政地理学，正在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空间战略地理学革命。如果说“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将是中国文化外部发展空间关系的革命的话，那么，“长江经济带”和中国城市发展规划带来的内部空间关系革命，将从根本上彻底重构文化发展的战略地理。现在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的深化改革也许还没有完成就面临重新设计的可能。战略重组和战略主体重构也许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高铁时代的全新选择。高铁改变了市场竞争的空间关系与形态。流动性增大所带来和导致的时空关系的演化使得一切变化都出于新的巨大的不确定之中。一切代步工具，都是人的社会生物性功能的创造性衍生。由此而带来的“中国宏观文化环境格局及其演变趋势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将不得不成为中国文化国情未来发展的重大课题。这是一个与大环境变化密切相关的课题，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于中国文化国情发展的认知与文化政策的重建。

4. 全球化是影响我国文化国情变化与走向最重要的外部动力因素

文化生产力既是一个地区性、民族性和国家性概念，同时更是一个全球性概念。尤其是在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文化生产力就成为一个对全球化进程与演化的书写与表达方式。全球化的程度成为衡量文化生产力进化的一个标志。因此，文化生产力不是哪个国家的文化生产力，而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文明进化的一种展现，体现和反映的正是人类历史文明的演进。应用于文化更新与发展的每一项科学技术，都是人类进化和全球史进化的结果。一般来说，那些没有自己完备的自成体系的文化生产力的国家和地区，是受文化生产力发达的国家支配的。它所享有的是全球性的文化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结果，因而具有全球史特征。这种文化生产力在当今世界表现是不完全、不完整和非整体性的。这既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关，同时也与一个地区和国家接受文化的精神生产力构成传统相关。一般来说，越是远离全球文明进化核心地带的国家和地区，其物

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进化越慢，对新文化生产力形态的接受与发展越具有阻隔性。这是形成与构成文化生产力发展现代性程度和世界文化生产力发展圈层结构——核心、边缘、半边缘——^①的重要原因。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生产力，不同时代的文化生产力都是它那个时代精神及其与世界关系的书写。文化生产的全球发展是在全球史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没有全球史的出现也就没有文化生产力的全球发展与全球文化市场的形成。全球史是当下中国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机制，也是当今中国文化生产力构成的重要机制与方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这一机制与方式的集中体现，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生产力的全球化参与和全球化进程。这是中国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如果说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还只是一般的表现全球史在宏观物质空间上的中国进程的话，那么，当代中国文化生产力发展则突出的表现了全球史在宏观精神空间上的中国展开。城市更新运动和城乡一体化运动把全球史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表现统一在当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全球史进程中，“创意产业园区”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中国的迅速扩张是它的典型表现形态。

“创意产业”是英国在工业结构调整、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提出来的，原本具有拯救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的意图，以避免在城市更新（“旧城改造”）过程中对城市文明的部分载体——旧仓库、旧厂房、旧码头、旧街区的摧毁，从而赋予了城市更新以新的内涵和价值——在城市更新中延续城市文明的价值实现；这种价值被运用于中国农村新一轮的改革发展，对于“拯救乡村”具有特别重要的文明意义。这是全球史进化在中国最新的反映，它建构了中国的“创意产业园区”建设与全球化进程的全球史关系，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文化生产力形式：全球史意义的文化生产力，从而使得中国文化产业建构出一种得以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与机制。在全球史的进程中，中国意识到并发展出了“文化走出去”与“国际接轨”的战略思维。文化产业作为全球史的实现方式，正在深刻影响和重构全球史的场景，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国情的全球化进程。因此，密切关注与深入研究全球化进程与中国文化国情发展变化的关系，是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中国文化国情变化规律的关键。

文化产业是中国文化国情构成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产业的本质是精神

^①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